

---

November 2016

## Behavior Language, Unconscious Structur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Dakang M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Ma, Dakang. 2016. "Behavior Language, Unconscious Structur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6): pp.6-1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6/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行为语言·无意识结构·文学活动

马大康

---

**摘要:**人的意识是由言语行为记忆建构的,无意识则是由行为语言记忆建构的。两种语言(行为)的共性和差异性决定着意识、无意识结构的联系和区别,也决定着双方既可沟通又不可通约的关系。因此,拉康以普通语言的结构来解释无意识是不严谨的。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是意识与无意识间的充分合作,是言语行为记忆与行为语言记忆间的充分合作,是双方的共鸣共振,两种语言(行为)的特征决定着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具有双重性。

**关键词:**意识; 无意识; 言语行为; 行为语言; 审美; 文学艺术

**作者简介:**马大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电子邮箱:mdk@wzu.edu.cn

---

**Title:** Behavior Language, Unconscious Structur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Abstract:** Human's consciousness is constructed by the memory of speech acts, and the unconscious is constructed by the memory of behavior languag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behaviors) determine the rel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that of the unconscious. Therefore, it does not hold water that Lacan use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to explain the unconscious. Aesthetic activities are the full cooperation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 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kinds of behaviors (languages) determine the dual character of aesthetic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Keywords:** consciousness; the unconscious; speech act; behavior language; aesthetic; literature and art

**Author:** Ma Dak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theory. Email: mdk@wzu.edu.cn

---

—

弗洛伊德(Freud)对无意识(unconscious)所做的解释打开了人的心理黑箱,不仅为精神分析提供了路径,而且广泛影响了其他学术研究领域。拉康(Lacan)继承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并展开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他运用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来阐释无意识,提出自己的重要观点: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167)。与以往语言学家注重语文学和词源学,关注语言的历时性研

究不同,索绪尔则把重点投向语言的共时性研究。他认为:在语言的具体运用,即言语(parole)背后,存在着一个总系统,也即语言(langue),这个系统操控着具体言说的结构规则。这些结构规则深嵌在言语之中,以致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语言的这种无意识结构吸引了拉康的注意,促使他认识到无意识所具有的像语言那样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拉康进而以雅各布森(Jakobson)提出的“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y)来阐释无意识,用这两种语言修辞对应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凝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以此来解释无意识的工作方式。

拉康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解释产生了抵牾。在元心理学著作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词表象”(word-representation)和“物表象”(thing-representation)两个术语,前者主要指衍生自语词的听觉性表象,后者则主要指衍生自事物的视觉表象,并认为人的意识基于物表象与相应的词表象的结合,而无意识则只包含着物表象。一件事情要成为意识的,就“应该通过和与之相应的言语表象建立联系而成的”(9)。显然,弗洛伊德强调意识与语言相关联,而把无意识与语言隔离开来,认为无意识与语言无关,可是,拉康却以语言结构解释无意识结构,这两种观点似乎相互对立。由此,也引出了一系列对无意识的误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两者间的矛盾呢?要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引入新的术语:“行为语言”及“行为语言记忆”。

在《文学活动中的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中,我们阐述了人之行为(表情、动作、姿态)是具有社会共享的意义和普遍可传达性的特殊的语言,甚至是人最基础、最原初的语言。<sup>①</sup>我们了解一个人,之所以需要察言观色,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并且往往更相信“色”和“行”,就因为行为本身就表达了意义,它具有类似于语言的符号特性,是“行为语言”,我们通过行为语言就直接知觉了对方,并以行为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来对照或印证言语所表达的意义,在比照中深入了解对方,解释真相。正如我们要懂得一种语言就必须掌握这种语言,也就是说,我们有对这种语言的记忆,即言语行为记忆;同理,我们之所以懂得行为语言,也因为我们具有“行为语言记忆”。正是行为语言记忆构建了人的无意识。可以说,人的意识就是言语行为记忆所建构的,脱离言语行为就无法实现意识建构;人的无意识则属于行为语言记忆。

行为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必须利用差异性来构建意义。但是,这种差异性不像普通语言那样建立在“概念/音响形象”区分的基础上,而是以“形象信息”区分为基础,是对行为模式的识别。行为语言和人的身体密切关联,本身就是身体行为,无法离开身体而独立,并深深嵌入了身体。行为语言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枢纽,人的感觉也与行为语言密不可分。胡塞尔就认为,人的感觉是与动感相统一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世界,因为它始终包含着行为、包含着基本

的主动性[……]只有通过我切身的(leiblich)活动,我才能获得我所有的感性印象[……]感觉的感知(‘感知’在希腊文中是‘aisthesis’)和由我所进行的身体运动(‘运动’在希腊文中是‘kinesis’)在这里构成了不可分解的统一”(胡塞尔 15-16)。人对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基础上的,任何外来信息都必须经过人的语言(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的建构,将其结构化,才能被人所接受和知觉,否则,就只是凌乱的毫无意义的信息而被忽略。其中,最基本的环节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关联生活世界,以行为语言来构建和同化生活世界,赋予生活世界以人自身的结构,由此把握了生活世界。世界也因此具有人的行为特征和生命特征,并和人建立起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人理解了世界,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生命方式掌握了世界。

行为语言作为“形象模式”而非“概念/音响形象”,从符号特性角度来看,它还只是一种发育不完善的、特殊的符号系统,缺乏普通语言的明晰性,虽然具有自己的意义,却不具备普通语言那种独立性和中介性,不能把人与世界相分离,更不能把行为与人本身相分离。它既是“观念”又是“存在”,恰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说:形式既不是一种自在之物,也不是自为的观念,而是“观念与存在间难以察觉的密切结合,是质料在我们前面展开意义的偶然安排,是萌芽状态的可感知性”(18)。这样一种发育不全、缺乏独立性的符号系统尚不能把世界构建为与人相分离的明晰对象,不能顺利进入人的意识,而只能将世界加以结构化并纳入己身,构成无意识。因为意识总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它以对象的生成,人与对象间的关系建构为前提,当行为语言把世界与人自身连接在一起并融合为一体,不是把世界作为“对象”来看待,它就不可能让人彻底摆脱朦胧、混沌的状态,不可能形成明确的意识。世界只不过作为被人体验的世界而存在,它既是“观念”又是“存在”。

唯有普通语言为世界万物命名,为人自身命名,以其“概念”区分万物,吸纳、凝聚、提升人的经验,才能形成人的明晰的意识;也唯有借助于普通语言的明晰性、独立性、中介性,人才与世界万物相区分,行为才与身体相区分。语言创设了人与世界及自身行为之间的距离,于是,世界、万物、

人的身体,以及行为才成为人的意识对象。语言将人的意向具体化了,并构建了明晰的意向对象。世界从“天地始”之“无名”状态进入“万物母”之“有名”状态,人终于既可以“观其妙”,又可以“观其徼”(朱谦之 5-6)。因而,语言概念与人的意识是同步生成的,语言同时构建了人的意识对象和意识,于是,世界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面前。这正是中外创世神话几乎都赋予语言以创世能力的原因。语言的明晰性、独立性、中介性不仅使世界万物成为人的感觉对象和认知对象,有效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同时,让人有可能超越实存来想象和运思,促使人类思维和人的意识发生质的飞跃,甚至把人提升到一个形而上世界。语言的明晰性、独立性、中介性也将人之行为与身体剥离开来,把行为与处境、行为与后果相联系并设定为人的反思对象,使人有了自觉矫正、调整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并赋予行为以明确的目的性,提高了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迅速改进人类实践。人之所以远远超出动物界,就因为言语行为的出现有力地促使人的意识发展,促使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sup>②</sup>言语行为终于使“自在”的人成长为“自为”的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同时秉持着两种相互协作的不同语言(行为):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并因此具有交相作用、相互协同的意识和无意识。

裂脑人(左右脑半球常规传导中断)实验也证实了意识、无意识分别与言语行为、行为语言的关联。在裂脑人实验中,实验者发现:当一个对象出现在病人的右侧视野,由于接收信息的左脑具有语言功能,他就能正确地说出这个对象;而当对象出现在左侧视野,接收信息的右脑因为是非语言功能区,他就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随后却伸出手去触摸、抓握对象。据此,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指出,人脑具有两个相互协作的意识(123—24)。其实,这个实验有力地说明:人脑并非存在两个意识,而是分别存在意识和无意识。左脑具有语言功能,同时是人的意识区域,只有它才能明确地意识到对象;而那个没有被人所意识却又导致人的行为的心理过程就是无意识,它处于非语言区,并运用行为语言记忆来指导人的行为。当然,左脑除了意识区域,也同样存在与行为语言密切相关的无意识,无意识贯穿于左右两个脑半球,意识则只存在于左脑语言功能区。

对于正常人来说,意识和无意识通常是相互协作的,正是这种协作,才使人能够通过行为顺利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便如此,人的日常行为仍然保持着大量无意识状态。“我们对于身体位置与动作的知晓一般是直接的和非反思性的。它并不经常伴随着我们留意着的、意识中的动觉感受,也不常在这种感受出现时从它们之中引发出来。成功完成的自主行为也不需要以这种对身体感受的留意作中介”(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168)。

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发音行为具有特殊意义,它既是由人发出并由人掌控的,从属于人的身体,又离开人的身体而独立。这种双重性决定着唯有它可能发展成为最完善的独立的符号系统,即语言(概念/音响形象)。为了适应人类活动领域广阔性、丰富性和人类社会交往频繁性、复杂性的需要,原本表达类似情境的发音行为不得不发生归并和简化,逐渐形成了“类概念/音响形象”,既走向抽象,又凝聚了人的经验。语言概念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发音行为对所表达情境的依附关系被剥离了,它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扩大了,并创设了人与万物间的距离,甚至可以把人自己的身体及行为作为对象看待,进而创设了人与行为,特别是发音行为的距离,也即创设了人与语言的距离。语言终于成为明晰性、独立性、中介性的符号系统。譬如《诗经·鲁颂·駟》中涉及马的名称就有16种,它们或因毛色或种属不同而异。《说文》表示马的名称则因年龄、毛色、形态、品种的不同而区分为42种。在人类实践过程中,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区分逐渐被放弃,大量无用的名称遭淘汰,归并为少数几个表示“马”的抽象概念。人类实践活动的独特性注定了行为语言(发音行为)走向抽象的必然过程,注定了行为语言(发音行为)向言语行为发展的必然过程。没有抽象就没有语言概念,没有语言,也没有超拔于动物界的人自身。

当我们阐明了人所具有的两种语言(行为):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并且指出人的意识实质上是言语行为记忆,而无意识则是行为语言记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弗洛伊德与拉康之间的观点分歧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与语言相关,无意识与语言无关,所强调的正是意识活动离不开言语行为,而无意识则并非根源于言语行为,它是另一种东西。当行为语言仅仅是行为语言,尚

未与言语行为相结合,它只能处在无意识状态;而当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交融,也即弗洛伊德所说“物表象”与“词表象”结合,那么,它才进入意识层面,双方共同构建起想象和幻想,或曰:形象思维。与此不同,当言语行为仅仅是单纯的言语表述行为,它虽然是意识活动,却只能是抽象思维。我们所意识到和记住的事件,其实是被言语行为表述和建构了的事件,而非实存的事件本身。那些尚未被言语行为表述和建构的事件,或虽经表述和建构却仍未纳入言语行为的事件“剩余”和“碎片”,就只能沉落在无意识之中。拉康所谓无意识具有像语言那样的结构,则是发现了无意识也由某种语言构成。不过,它应该指“另一种”特殊的语言,即行为语言。无意识具有行为语言的结构,并和言语行为结构有相通之处。因此一般地说,弗洛伊德和拉康两人的发现并没有构成实质性冲突;但是深入地看,拉康以普通语言来解释无意识,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则又不够严谨和科学,这固然可以猜到无意识的某些特征,却无法真正揭示无意识的结构。

## 二

意识、无意识之间的联系及区别是同两种语言(行为)的共性、差异性相关联的。无意识作为一种行为语言记忆,必然具有行为语言的结构。任何语言,其基本前提即共享的意义和可交流性,它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社会规约之上,否则,就无法达成交流,也就不再是“语言”。这些规约随同行为语言被个体以特定方式内化,成为人的无意识结构,它塑造着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以及相互理解和沟通的能力。言语行为与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也相同。普通语言之所以成为最便利、最主要的人际交流工具,也因为并非属于“我”个人,而属于“我们”,具有公共性。普通语言背后就隐含着共同的文化惯例。由于在实际的交流活动中,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是互为背景、相互交织、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相互诠释的,这种密切关系致使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在结构上形成许多共同点,也即行为语言所享有的社会规约与言语行为享有的文化惯例之间有许多共通性,在某种程度上,双方存在相互沟通、相互替换的可能性。

从两种语言(行为)的发生历史来看,言语行为是建立在行为语言的基础上,意识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上的。言语行为是以概念和逻辑对行为语言的改造和重铸,是对行为语言的超越和升华,这就势必使得行为语言及无意识相对于言语行为及意识具有先在的决定意义。无意识是一切精神生活的背景。行为语言的先在性注定了言语行为及人的意识不能完全背弃行为语言的结构。恰如杜威所指出,许多语词既指行为过程,又指最后产物。没有这些词的动词意义,也就没有这些词的名词意义。这并非偶然的巧合,恰恰是行为语言结构为普通语言所打下的烙印,行为的动态特征势必授予动词在普通语言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人的无意识,也即行为语言记忆,存储着人的行为模式,保留着行为所具有的结构,由此影响了言语行为的结构特征,影响了意识的结构特征。因此,应该颠倒过来说:语言结构是受到无意识结构影响的,并非拉康所说无意识有像语言那样的结构。普通语言是在后来的独立发展过程,特别是书写文化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

但是,两种语言(行为)毕竟有着不同的载体、特性和功用,有所分工,大体上被运用于不同领域,因而它们又形成相区别的结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谈到20世纪西方医学和心理学对肢体语言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发现:“语法、句法和逻辑范畴都不适合于肢体表达,因为这些范畴都要对能指的整体进行切割和拆解,因此不符合肢体表达不容拆解的特点。”“肢体符号具有多义性(即拥有多个意义),而且肢体信息也不遵守通常的‘句法’次序(主语—谓语—宾语),所以肢体信息更像是孩童的言语和‘原始’的语言”(325)。人的无意识是由行为语言记忆建构的,它不能不被打上行为语言的独特印记。

一方面,行为把人与世界相关联,把它们构建为一个统一体,这固然展示出行为的特定结构,但是,其中却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与普通语言不同,行为语言是非概念的,行为语言的统一体既不区分“主语”“谓语”和“宾语”,更不存在语法和逻辑秩序关系;它没有时态特征,不作“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时间概念切分和标记,是时间的无限绵延,却持存着行为的韵律和节奏;它不作空间区隔和定位,而把空间融合为一个有机

整体,并且空间性与时间性是并重的,本身就是统一体;它是“无名”的,形象性的,浑整连贯的。<sup>③</sup>同时,行为语言依附于身体的非独立性,也注定它直接与身体感受密切关联,注定行为语言不仅是形象性的,而且总是激发起情感并始终伴随着情感,反过来,情感又激励行为语言,为行为语言注入不竭的动能。无意识是心灵中“黑暗的一隅”,“人一旦照耀到无意识的领域,他也就立即踏入了朦胧不明的个人无意识范围”(荣格 129)。因此,由行为语言记忆构建而成的无意识,也就必定与言语行为的结构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与意识的结构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行为语言的非概念性、非逻辑性决定着无意识与理性无缘,而具有模糊、混沌的一面,以致相类似的内容很可能发生“凝缩”,相紧邻的内容则可以发生“移置”。同时,无意识也难以准确、完整地普通语言所翻译、描述和分析,它是模糊多义的,任何翻译、描述、分析都必定会或多或少扭曲无意识本身,是对它这样或那样的猜测甚或误释。除非受到言语行为的激发、整理和凝聚,与言语行为相互融合,它才能以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得到展现,才能被意识所察觉,否则,就只能默默沉潜于无意识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行为语言中的主客体尚未分化,“对象”尚未分离和确立,在受到言语行为重塑之前,它也就不可能进入以意向对象为必要前提的意识状态。

另一方面,行为作为一种语言,必须遵循社会规约,人的无意识的结构就受制于社会规约的结构。行为语言所遵循的规约,并不属于某一个体,也不属于某一行为,它存在于“他处”。它无法被言说,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是客体,却又如意识形态那样是“空无”的客体,是一个虚空的、客观存在的“他者”,并且只属于群体,属于社会,属于种族,属于传统,这个他者就像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capitalized big Other)。大他者主宰着人的行为语言,随同行为语言以个人独有的方式内化于人的心灵,赋予人的无意识以结构。人之行为就是凭借社会规约(大他者)才成为行为语言,才可以让人们相互沟通、理解,才可能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作用。更根本地看,就因为存在社会规约(大他者),人才成为社会性的人,人类社会才能延续,人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是规约确保了一个社会和一个群体的内部稳定。反过来,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行为差异又为群体自身做出界定,

进而构建起特定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看,在言语行为及意识、行为语言及无意识、社会规约及社会秩序三者之间又存在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结构关联。

“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只是在言语行为出现之后才真正成为可能。“个体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而被构建为主体的。主体性就是说话人将他/她本人作为自我的能力,不能以任何方式通过对自身的无言感觉来定义,也不能用自我的某种无法言表的精神体验延缓之,而只能通过超越任何可能经验的语言的自我”(阿甘本 39)。语言这一功用,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就做了很好的阐释,他指出:言语活动每次都把言说者带入特定的情境和话语的不同构造之中。在任何语言里,言说者都把“我”占为己用,同时或隐或显地展现出“你”,以便共同对立于“他”,由此设立一种关系,设立一种崭新的人类体验,代词“我”就从聚合的一个要素,转变成一个独一的称呼,并且产生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就是“我”,就是作为言说“主体”的人。主体性就是“通过言语活动并在言语活动之中安身立命的主体主观体验”(142—43)。正是语言把参与言说行为的诸要素加以区分、定位,授予各自不同的功能,既不断分割着整个言说行为的统一体,又构建着言说诸要素间的新关系,确定着诸要素的作用和地位,凝聚言说者的体验和经历,逐渐构建起话语“主体”和“客体”。人的自我观念和主体性就是在此过程建立起来的,言语行为明晰的结构特征也就是在此过程确立的。

自此,原先由行为构建的统一连贯的整体被语言概念所切分和确定,人与世界及万物的浑融关系被分解,进而被纳入语言的线性秩序,被拆解的各个成分也被分别予以命名,赋予特定功能,主、谓、宾关系形成了。一旦普通语言将行为统一体重塑为线性结构和秩序,时间也相应得到命名和标记,时态性展示出来了,因果关系(前因后果)和逻辑关系也逐渐建立起来。语言促使人从世界中区分出来并获得独立,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即空间关系也因此产生并得到确定。但是,随语言的线性特征而得以强化的时间性,却促成时空统一体的瓦解,并贬低了空间性的地位。言语行为的出现培养了人的自我反思能力,它终于把理性授予人自身。言语行为的结构也就是人的意识

结构。言语行为明晰的结构特征和秩序性决定着意识的理性特征和逻辑特征。与此相对,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的结构差异则决定着普通语言无法对等地去翻译无意识,无法穷尽无意识而不得不遗留下大量剩余,双方虽然相关联、可沟通,却不可通约,以致不得不经常运用语言隐喻和象征来委婉地表达。

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结构差异说明,不能简单地套用拉康的方式来解释无意识。拉康之所以可以猜到无意识的某些结构特征,是因为言语行为的深层结构即文化惯例,它是言语行为在长期运用过程,与语言概念相剥离而积淀的行为惯例,实质上已经不再是言语行为本身的结构,而是退化为行为语言(发音行为)的结构,它与行为语言的社会规约密切相关并建基其上。这种关联性致使拉康能够在某些特定方面揭示无意识结构。但是,由于两者毕竟存在差异,以语言结构来解释无意识也就势必会产生误导,以致得出错误结论。

对所有生命而言,“记忆”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生命就是依赖于记忆的。人的意识取决于言语行为记忆,无意识则取决于行为语言记忆,而DNA实质上就是细胞复制行为记忆。记忆之所以对于生命极其重要,就在于它是生命在时间轴上不断延续的保证,因为宇宙运行是周而复始的,正是记忆赋予生命以存活的能力,使它能够在周期性变化的宇宙运行,其本身是自然选择的成果,源于生命长期进化的历史。一切生命都必须有记忆才得以生存,是记忆使生命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适应,在自然界发生周期变化之前就预先做好了应对准备。丧失记忆能力,也就丧失了对环境周期性变化的预期和应和,以致生命不得不因此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同样,一旦自然规律被打破,出现重大灾异,记忆不再能够适时做出应对,无法主动适应突变的自然,也会导致大面积的物种灭绝。没有记忆,就无法适应周期性变化的自然,就注定被淘汰。恰恰也正是记忆,使人的行为方式得以代代相承,并享有某种共同规约,使行为成为可交流的特殊语言。

记忆也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认同最核心的是对行为的认同,是对行为语言的内化和记忆,只有行为才真正授予他以身份,使他名副其实。在自我认同过程中,个体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不断重复和强化着对自身的行为语言的记忆,

构建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语言风格,为行为语言打上自己的标志,并在不同场合都努力展示与自我相吻合的行为语言风格,维护行为语言风格的连贯性,而意识则只是对这种行为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及其与自我关系协调性的确认。<sup>④</sup>社会认同则是对群体行为规范的习得,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效仿群体行为,并将群体行为所包含的规约以个人方式内化于己身,以便与群体保持和谐关系,顺利融入群体,获得群体成员的身份。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特定社会规约的记忆。这主要是一个无意识的习得过程,意识往往只是在个体习得群体行为规范出现障碍时,才发挥指导、调节和矫正的作用。从实际过程看,无论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无意识过程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认同是多重的、重叠的以及对语境敏感的,有些认同是相对比较细微的或转瞬即逝的”(阿皮亚 136)。对每一个体来说,其成长过程同时存在着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他踟蹰于两者之间,力图融入群体又维护自我独立,既“离心”又“向心”,就如皮亚杰(Jean Piaget)所说,是一个“同化—顺应”的过程,只不过不同个体有不同倾向。当个体在行为语言构建过程失却方向感,或者自身原有的行为语言与其所归属群体的行为语言发生抵牾,又无法将群体的行为规范顺利地予以内化,这就构成认同危机,由此丧失安定感和安全感,产生内心焦虑。

与人相比较,计算机只具有一种介于行为语言记忆与言语行为记忆之间的能力。计算机把行为加以切分和编码,予以简化、抽象化、机械化,并赋予它种种程序及记忆能力、识别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因此,在技能方面计算机完全有可能超越人,但是,它却没有人的思想。计算机只能够“思维”,却不能“思想”。即便机器人说着人的语言,用语言写作,甚至写文学作品,其实,都是把言语行为转换为特殊的、高度抽象的、机械的、被割裂和编码的行为语言,转换为一种技能。只有这种技能是可以用机器来替代的,而思想则无法被机器所取代。机器人永远不可能像人那样用“概念”思想,也不可能用“形象”想象。机器人既不能享有意识,也不能享有人类无意识,它只有种种工作程序,或云:“类思维”。

人的行为语言记忆因其不同类型而分别构成深层无意识、表层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种族在生命活动中不断重复的行为语言记忆建构了深层

无意识,也即本能,如性本能、死亡本能等等。人的深层无意识(本能)就源于种族的历史,它只能说着种族的行为语言,说着“他者”的语言。因此,欲望并非属于“自我”,而属于“他者”,是“他者的语言”。个体的行为语言记忆则属于表层无意识。那些原本与言语行为结合在一起,后又脱离普通语言而被孤立和遗忘的行为语言记忆也沉潜于表层无意识。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一个体都必须生活于特定社会群体,因此与特定群体的社会规约处在某种紧张关系中,既不得不主动适应群体的行为规范,又试图摆脱束缚,维护自身独立,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为语言,并内化为无意识结构。其间,随同行为语言一起被内化的群体行为规约,就构成集体无意识。与荣格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在此,集体无意识体现着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它既体现为相互交织的同时性网络结构,又层叠着历时性沉积。人的个体性只能存在于历史遗存与行为规范体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存在于特定社会规约的裂隙中,它是所继承的历史遗存与偶然境遇相交集而共同形成的,只能是传统这个浩瀚沙漠中偶尔绽放的一朵小花。所谓“主体”和“自我”也只能建立在“他者”的基础上,建立在异己的沙砾上,同时又不断地向另一“他者”开放。种种记忆不断积淀下来,塑造着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塑造着人的无限丰富的心灵。

与意识的心理实质不同,无意识既是心理的又与生理密切相关,因为行为语言本身即身体行为,是身体表演,具有肉身性,但作为一种语言记忆又具有精神性。人的深层无意识(本能)就基于生命体生化构成及水平的变化。当生化构成及水平的变化达到或超越某一阈限,生命体就察觉了这种变化并做出心理响应,启动行为。前一个过程是生理过程,后者则是无意识心理过程,然后是外显的身体行为。意识则只是起着监视和调节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深层无意识(本能)是活动能量所在,它强劲地推动着人的行为。随着欲望的满足,能量得到舒泄,生命体重新恢复内部平衡。表层无意识则更多地主导个体的行为特征,同时又反身重塑行为者自己的身体。个体的这种行为方式得到意识的确认或矫正而被视为自我个性的表征,以及自我建构的重要基础。在此,历史遗传与当下的社会规范体系相互交集,肉身与精

神相互影响。这也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博弈,社会文化不能不为个人的身体及行为镌刻下自己的印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示着福科(Foucault)所说的“规训”、阿尔都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传唤”、布迪厄(Bourdieu)的“惯习”和“区隔”,也显示着个体无可奈何的沉默反抗,或如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计谋”和“战术”。与深层无意识相反,集体无意识主要是一种保守力量,它强制性地要求把行为纳入规约,甚至为某些行为下达禁令,阻止行为的发生。这就是压抑。因此,压抑不仅表现在人的意识监视、管理和过滤行为语言的过程,更主要的是沉积于无意识中的社会规约构成了压抑的主要来源。这些规约层层累积,致使深层无意识(本能)往往难以直接得到表达。在无意识的黑箱中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行为语言记忆及不同力量间的冲突,存在着压抑与反压抑,但是,由于无意识结构的非逻辑性和非理性特征,诸因素又可以同时共存,并不相互排除。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集体无意识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深刻揭示了行为背后隐含的制约因素,展示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共性,进而透露出特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

### 三

在日常交往活动中,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是相互协作的,譬如,我们在交谈中常常不自觉地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此时,行为语言虽然参与了言语活动,为言语行为创设了一个谐调的语境,增强了言语行为的表现性和感染力,但毕竟只是配角,起着相对次要的协助作用。可是,在审美活动或文学艺术活动中,这两种语言(行为)不再仅止于一般性地协作,而是发生了极充分的深度合作,是言语行为记忆与行为语言记忆的共鸣共振,是意识与无意识的交汇激荡。

因为言语行为记忆缺席也就是意识的缺席,单纯的行为语言只能沉没在无意识的汪洋中,只能是阿甘本所说的“沉默的经验”,无法成为意识觉知的对象,自然就取消了任何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同时,也只有言语行为充分地参与其间,行为语言所造成的身体快感才能被提升为心灵愉悦

而转化为美感。“只有当语言发挥作用,心灵才能从身一心经验中显现出来,因为语言使有机体的感受和动作得以命名,并因此被对象化、被赋予确定的含义;这样,在交流过程中就可以被重新确认和使用”(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260-61)。同样,离开行为语言记忆,言语行为也将失却形象性、生动性和生命感,退化为毫无生气的抽象的思维。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常说文学艺术创作需要童真,不仅因为儿童的心灵纯洁无瑕,更在于儿童有着尚未受到遮蔽、玷污和压制的行为语言,他对世界的感受更倾向于运用丰富的行为语言,以行为语言来关联世界、同化世界,把世界拟人化,赋予世界以生机勃勃的气息。“如果一个人不感知这种跟某一种后果的状态结合在一起而发生作用的运动倾向,那么他就只有情欲上的满足而丝毫也没有所谓欣赏。对于运动倾向的感知使我们紧张、刺激、兴奋,对完成、圆满终结的感知则给予我们以平静、形式、尺度和组织”(杜威,《经验与自然》240)。在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中,只有当两种语言(行为)发生深度合作,相互激发,我们才能真正敞开心扉,洞悉神秘底蕴,不由自主地受到震撼。这种介于两种语言(行为)之间,又充分挖掘两种语言(行为)潜力的特征,决定着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的边缘性。

审美及文学艺术需要意识与无意识的充分合作,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在《创造的秘密》中,阿瑞提指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经历原初过程(无意识过程)和次级过程(意识过程),是两者的结合。杜威则从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的整体性角度对此做了阐释。他认为,在任何行为领域中都能获得审美经验,只要零碎的经验变为连贯、完整的和有意义的“一个经验”,就可以成为审美和艺术的胚芽。在此过程中,人的身心是作为整体参与艺术活动的,他扩展自己的生命的意图,依照自己的机体结构,包括脑、感觉器官,以及肌肉系统间的协同来开展工作。“所有的深思熟虑,所有有意识的意图,都在曾通过自然能量相互作用而有机地活动的事物中生长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艺术就将建筑在颤动的沙滩上,不,流动在空气中[……]艺术是人能够有意识地,从而在意义层面上,恢复作为活的生物的标志的感觉、需要、冲动以及行动间联合的活的、具体的证明”(《艺术即经验》25-26)。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最大

程度调动了作为整体状态的人,调动了意识与无意识,调动了言语行为记忆与行为语言记忆,从而实施着“上帝创世”般的活动。

正如前文所指出,社会规约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并成为对行为语言记忆的压抑,它往往只放行符合规约的行为语言,压制违规的行为语言。但是,社会规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并只在特定语境中发挥效用,离开这一语境,它就被搁置了。譬如当一位教师处身学校师生群体之中,他很自然地就按照教师的规范行事。一旦回到私人空间,这些规范就失效了,他不再需要随俗俯仰,而是完全放松了自己,率意而行。审美活动所构建的世界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另一天地”,或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异在世界”,这一世界的非现实性弱化乃至弃置了集体无意识对行为语言记忆的压抑,致使人的深层无意识得以充分释放,使人的行为语言记忆和言语行为记忆获得了无限动能并发生深度融合。这正是审美创造力形成的内在机制。

意识与无意识相协同,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交织的边缘状况,赋予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以双重特征:一方面,行为语言把人与世界相联系、相融合,以行为语言将人与世界构建为一个统一的生命体,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融合,弥合了双方的分裂,取消了审美对象的对象性,创造了一种无物无我的浑融关系。在此过程中,世界为人的生命所灌注,万物为人的情感所浸染,并都成为有感有情的生命活动本身,分享着生命的形式和节奏,看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里普斯(T. Lipps)的“移情说”、谷鲁斯(K. Groos)的“内模仿说”、克罗齐(B. Croce)的“直觉说”,实质上就建立在行为语言特征的基础上。这也正是审美和文学艺术总是抹不去“泛灵论”观念和始终维持着加达默尔(Gadamer)所说的“同时性”的根源。另一方面,言语行为则为人与世界重新设定间距,将人建构为主体,将世界作为人的对象呈现出来,将生动的具体形象与其语境区隔开来,凸显出来,并将它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与此同时,也将行为语言记忆加以整理、组织和塑造,以意识的理性光辉照亮对方。鲍姆嘉通(Baumgarten)所说的“感性认识的完善”、康德(Kant)的“反思判断力”就着眼于审美活动中言语行为的作用。在此,言语行为主要起着一种激发和凝聚行为语言

记忆,提升直觉经验,以使其上升到意识层面的作用,并非以概念来强制性地分割、规范、剪裁它。正是意识与无意识交相作用,以及这两种语言(行为)的充分合作,创造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一你”关系,也即主体间性关系;也正是意识与无意识交相作用,以及这两种语言(行为)的合作,致使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既是认知的又是体验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既是自觉的又是自发的,既是中介性的又是直接的,它们同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色彩,兼具精神与身体之悦,兼具“有我”与“无我”、“有名”与“无名”、时间性与超时间之境。“使一个经验成为审美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抵制与紧张,将本身是倾向于分离的刺激,转化为一个朝向包容一切而又臻于完善的结局的运动”(《艺术即经验》60)。从上述双重特征看,无论是符号学或现象学、认识论或存在论的单纯视野,都不能充分揭示审美和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研究必须具有一种综观的人类学视野。

尼采(Nietzsche)曾阐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艺术活动中就包含着这两种精神,但两者又非平分秋色,而是有所偏倚,并分别构成了酒神艺术与日神艺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任何文学艺术都是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充分合作的成果。其中,酒神艺术即行为语言占优势的艺术,行为语言弥合了人与世界的间距,令人融入了世界,陶醉于世界,人与世界浑然一体,并以人的生命意志洋溢于世界;而在日神艺术中言语行为则占据优势,言语行为创造了人与世界的间距,让世界转变为人的观照对象,并将语言所具有的理性光辉投射给世界,宛若日神朗照乾坤。“一切存在的基础,世界的酒神根基,它们侵入人类个体意识中的成分,恰好能够被日神美化力量重新加以克服。所以,这两种艺术冲动必定按照严格的相互比率,遵循永恒公正的法则,发挥它们的威力。酒神的暴力在何处如我们所体验的那样汹涌上涨,日神就必定为我们披上云彩降落到何处”(尼采 108)。在具体的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中,两种语言(行为)究竟哪一方居主导地位又取决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学艺术类型。如果从文化创造的本源来看,则应该颠倒过来说:人类的所有文化都奠基于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之上,两种语言(行为)既共同塑

造着人的心灵结构,又决定着人类文化创造。特定文化的深层结构就取决于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双方的特征、相互关系及整体结构。或者说,文化的发展变化展示了人与社会规约、文化惯例之间的紧张关系,它是一个不断构建规约、惯例又破除规约和惯例的过程。只有从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特征及相互关系入手,我们才可以破解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独特性。

正因为审美过程同时存在着两种语言(行为),所以,王国维在谈到诗人的创作时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周锡山 367)。当行为语言占主导,诗人则入乎宇宙人生之内;一旦言语行为居于主导,诗人又出乎宇宙人生之外。诗人占据着边缘位置,不断地在意识与无意识间穿越,在两种语言(行为)构成的张力场中震摆,从一侧转向另一侧,由此发挥两种语言(行为)的作用,获得最佳的创作状态。这种意识与无意识间极其充分的深度交流和谐振,也即创作的灵感状态。

#### 四

行为艺术和文学活动正处在两种语言(行为)相合作的两个极端。

在日常活动中,人的意识所关注的焦点往往是行为目的,意识的意向性特点则使得目标之外的行为本身隐失于无意识之中,使人忽视了行为本身。行为艺术则把行为从其活动的整体生活空间中孤立开来,凸显出来,造成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间距,这也就悬置了行为的现实目的,使行为本身赫然成为人所凝视的对象,成为意识所聚焦的对象。行为艺术迫使人不得不直面行为,反思行为,并从行为中发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隐含意义。行为艺术的这一特点恰恰是充分利用了两种语言(行为)间的合作。在行为艺术中,行为本身成为以身体(或其他事物)描述和展示的对象,却又将行为与身体相剥离,在展现行为的同时藏匿身体。“艺术遂将物质的身体排除于造型的领域之外,身体只有以再现的方式呈现人像而非人身”(勒伯 121)。对于欣赏者而言,它又同时唤醒了无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和意识中的言语行

为记忆。唯有行为语言记忆(并非行为)与言语行为记忆(并非言语行为)都参与欣赏过程,唯有意识与无意识双方相互合作,行为本身才能真正从无意识状态转变为一个欣赏对象和思考对象。言语行为记忆总是不可或缺地介入行为艺术的观赏过程,于是,行为不再融化于人的身体,不再隐失于无意识的日常活动之中,在观看和反思中,它成为“观念”和“理论”,令人瞩目地把行为自身及其意义展现出来。因此,即便从表面上看只是由单纯的行为语言展示的行为艺术,其实也是两种语言(行为)的合作和交融。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同样离不开两种语言(行为)。在文学活动中,言语行为既把人的行为作为叙述的重要对象,同时,又把行为语言记忆作为激发的对象。这是两个相区别又协同的过程,前者关注的是被叙述对象的外在行为,并以言语行为这一媒介加以表述和描摹;<sup>⑤</sup>后者则以言语行为来激发、调动作者(或读者)无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就在行为语言记忆被充分激发和调动起来之际,被叙述对象的行为不再仅仅被作者(读者)所观看,同时为作者(读者)无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所效仿,并由行为语言在作者(读者)与被叙述对象之间建立统一的、融洽的关联,这就是文学创作(欣赏)中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过程,也是体验过程,移情、内模仿、共鸣和自居的过程,并构成不知我之为蝴蝶、蝴蝶之为我的境界。这种关系既非原始混沌,因为言语行为已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并以普通语言塑造着一个晴朗、明晰的世界;又非物我对立或分立,因为行为语言记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弥合着作者(读者)与被叙述对象间的鸿沟,并构建一个声、形、情、意并茂的整一的属人的世界,一个存在的家园。文学世界就是由两种语言(行为)共同构建的世界,我们所说的文学活动中的“言语建构行为”<sup>⑥</sup>实质上就是两种语言(行为)的相互协作。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取决于两种语言(行为)的协同和力量凝聚,产生于两种语言(行为)交相作用的过程,它不断地随同两种语言(行为)的展开、交织和相互激荡而生成、流变、拓展。文学活动中两种语言(行为)相融合这一状况,使得任何仅仅从普通语言角度来阐释作品意义的努力不能不落空,以致我们只能从具体的欣赏实践出发,在动态中去体验、领会、悟解,而不可将其置于眉睫之前。

在《从文本到行动》中,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谈到诠释学的内在矛盾,他指出,狄尔泰区分了“说明”和“理解”两种阅读态度,并将这两种态度分别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和精神科学领域。但是,一旦我们追问诠释学的科学条件,就会发现这种区分会变得模糊不清:“冲突在于:一方面,诠释概念被从属于理解的心理概念,具有从理解的心理概念而来的直觉的不可证实的特征;另一方面,它要求具有与精神科学连接在一起的客观性。诠释学这种在趋于心理化和寻求诠释逻辑之间的分裂,最终牵涉到理解和诠释之间的关系”(155)。利科的困惑起因于言语行为本身的复杂性。言语行为总是牵扯着行为语言,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撇清与行为语言的干系。特别是文学作品,其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是充分合作的。当我们仅仅着眼于言语行为,考察言语行为本身,那么是大体可以从中寻绎诠释逻辑,寻求科学性的客观基础的;但是,一旦涉及行为语言,看到两种语言(行为)的交互作用,我们就不得不凭借体验和直觉,不可避免地趋向心理化,并且我们的理解也就具有不可证实的特征。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结合所产生的独有特征注定了诠释学的两难境地。

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语言活动的特点在于: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语言空间,无论这个空间同现实世界是否接近或相似,它都是非现实的语言空间,就如约翰·塞尔所指出,它暂且放弃了话语与世界相互适应的趋向。语言空间的非现实性,悬置了社会规约的有效性,也解除了各种内心压抑,从而不仅使得表层无意识中的种种行为语言记忆得到顺利表达,畅通无阻,而且深层无意识(本能)也得以释放,人的生命力得以释放。反过来,人的深层无意识(本能)又为行为语言记忆注入巨大能量,为意识注入巨大能量,为言语行为注入巨大能量,它推动言语行为创建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并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两种语言(行为)的协同作用,发掘出人的巨大潜能,让人同时赢得了最幽深的无意识世界和最缥缈的形而上世界,把人的身体和灵魂绞合在一起。

文学艺术这种将自身区隔于现实世界之外、创造非现实世界的做法,构成了审美解放和审美抑制的双重机制。一方面,非现实性撤去了各种压抑,解放了人的无意识,解放了行为语言记忆;

另一方面,意识对非现实性的察觉,又抑制了人的现实行为,促使人放弃现实行为,只允许行为语言记忆与言语行为记忆相结合并活跃于心理层面,以此来实现心灵体验。由于无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获得解放并被激发出巨大能量,这就让人充分体验到生命感和自由感;而这种自由又仅止于心灵的自由和想象的自由,并非现实的行动自由,因此,文学艺术只是自由的象征。

然而,这种对无意识乃至深层无意识的解放,并非限于对过去行为的追忆,让人重返往昔或原始,并非仅仅是怀旧,是一种保守力量,相反地是向未来开放,具有一种革命性。即便是深层无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当它挣脱集体无意识的压抑和意识的监控,也就重新获得真正的创新能力。这是生命力的勃发,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自己,把人引向崭新的领域。而无意识的非逻辑、非理性特征,则致使各种相龃龉的行为语言记忆错杂共存,并有着相互交集的可能性,一旦被撤去压抑,进入狂欢状态,它们就成为冲决意识中的逻辑束缚和理性局限的力量。人类文明的创造固然是以对人的本能压抑为代价的,文明发展的历史也确曾不断累积着种种压抑,但是,文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了减轻压抑,给予人更多的自由,让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因此,文学艺术活动对人的无意识的解放,对行为语言记忆的解放,恰恰预示着人类未来的生活图景,闪耀着人性光芒。文学艺术是对人类未来的期许和承诺。

在文学艺术活动中,意识与无意识、言语行为记忆与行为语言记忆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处于平衡态,更经常的是双方存在着频繁的博弈。从历史过程看,有一个波浪型的发展演变轨迹:原始艺术偏重于无意识及行为语言记忆,偏重于非理性的迷狂;对意识和理性因素的重视是随着书写文化,特别是印刷文化的出现而得到渐次强化的,并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在后现代时期,则又因对理性中心主义的抗拒和对娱乐因素的强调而重新转向无意识及行为语言记忆。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身体写作,除了揭示身体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身体所打下的权力印记,其要旨就在于认识到长期以来男性对话语权的掌控,因此,语言中心主义以及如影随形般的理性中心主义,就必定渗透着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要挣脱男性的钳制,女性作家就应该用身体写作,其实质就是突

出行为语言记忆的在写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突出无意识的主导作用,借此摆脱语言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

在当前新媒体时代,无意识及行为语言记忆更赢得了自身的意义。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就指出新媒体时代一个令人吃惊的矛盾现象:对身体的重视。他说,当长途通讯使人的身体不再在场的时候,当媒体新技术挑战真实身体的切实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却好像越来越重视肉体,对肉体顶礼膜拜。尽管媒体越来越虚拟,身体却好像变得越来越紧要了。对这种矛盾现象,舒斯特曼的解释是:媒体关于漂亮身体的广告部分地助长了对身体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人自身直接经验的品质。这种对增进个人身体经验的追求,对充满活力、有自我变革能力的身体的重新确认,“是某种完全不同于媒体鼓吹者所认为的身体影像的东西:迟钝而呆板的身体——作为媒体的电子灵活性的充满惰性的对立面。虽然身体与大众传媒的对立仍然保持着,但是,这种形成明显对照的媒体影像——不是作为被动的、静态反映的镜子,而是作为明显具有无限范围和能力的积极的创造者”(《生活即审美》184-85)。为此,舒斯特曼提出构建“身体美学”这一主张。

新媒体改变了人际交往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变更为虚拟交往,一种身体不在场的交往,也就使得原有的社会规约失效了。这势必造成人的认同危机,改变人的无意识结构,而且这种改变并非改变人的深层无意识(本能),而是改变由各种规约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弱化压抑机制,致使行为语言记忆获得狂欢的机会,并导致理性的解构和非理性的张扬。于是,身体、欲望及无意识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凸显,还在各种生活领域泛滥开来,它甚至不再局限于无意识心理及行为语言记忆,不再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直接展示身体行为来挑战传统习俗,以此吸引眼球,博取注意。

从更长时段来看,新媒体这种非面对面的远距离虚拟交往,也将致使行为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效用被愈加削弱,并因此变得苍白无力,它原本活灵活现、多彩多姿的丰富“语汇”将逐渐被抽象的、模式化、符号化的脸谱和图谱所取代,行为语言将不得不褪色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弃置了。

于是,人不再充分享有行为语言所带来的直接经验。一个只有知识,没有经验的时代来临了。新一代恰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唐·吉河德,“只能经历但不能拥有经验”,或如桑邱·潘沙“只能拥有而不能经历经验”(13)。经验的丧失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典型趋于消亡,而且也将使文学艺术失却现实的根基。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梦魇,经验的缺失必定导致文学艺术的生命弱化,年轻一代作家只能沉溺于凌空蹈虚的幻想或复制和拼贴之中。

当然,新媒体所预示的前景未必如此悲观。舒斯特曼开辟的“身体美学”,就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应对的新路径。他所谓的“直接经验”和“身体经验”,主要是我们所说的无意识及行为语言记忆。他强调通过锻炼身体行为,把人的行为语言纳入健康的轨道,进而改善人的身心结构,实现他的“身体美学”的主张。

新媒体注定要改变人类未来,它同时给人类生活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人的身心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也将为文学艺术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

#### 注释[Notes]

- ① 关于行为语言的详细论述参阅马大康:“文学活动中的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文艺研究》3(2016):20—31。
- ② 与口头语言相比,书面语言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人与世界间的裂罅,加强了人的反思能力和理性能力,而且加大了语言与人之间的分裂,使语言和意识本身也成为受人审视和反思的对象,推进了语言和思维的合理性、严密性、科学性,并促成知识的诞生。不过,这与本议题关系不大,故存而不论。
- ③ 譬如在普通语言中“我爱你”,“我”是主语,“爱”是谓语,“你”是宾语。可是,在行为语言及无意识中却不存在这种区分,非但没有“我”与“你”之区分,没有“主语”与“宾语”的区分,甚至“我”和“爱”这一行为也没有被区分,它们重叠在一起,融合为一体;而“我”与“你”则被“爱”这一行为所连贯和统一,我只是行为的施行者,行为就体现在我身上,你则是受施者,和行为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受到行为的影响,它们都尚未被命名,被分割,是一个浑整的行为连续体。
- ④ “自我认同”既是与他人相区分和划界的过程,又是认同自我历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自己行为语言风格的建构仍然离不开种族和传统,离不开“他者”。在他为自己的行为增添新的个人因素的同时,不可能以纯个人的方式存在。

⑤ 人的意识活动或无意识心理活动,同样可以作为文学的描述对象,只不过这是对言语行为记忆、行为语言记忆及其活动状况的描述。

⑥ 参阅马大康:“言语行为理论:探索文学奥秘的新范式”,《文学评论》5(2015):73—82。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 [Dewey, 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Trans. Fu Tongxian.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 *Art as Experience*. Trans. Gao Jian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 [Husserl, Edmund. *The Life World of Phenomenology*. Ed. Klaus Held. Trans. Ni Kangliang and Zhang Tinggu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Benveniste, Emile. *The Problem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ng Donglia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韶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
- [Freud. *The Philosophy of Freud's Psychology*. Trans. Yang Shaogang.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15.]
- Lacan, Jacques.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The Psychoses, 1955-56 Bk. 3*. Trans. Russell Grigg,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 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陈永国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 [Agamben, Giorgio. *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 Chen Yongguo.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Appiah, Kwame. *The Ethics of Identity*. Trans. Zhang Rongn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Shusterman, Richard.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 Alterna-*

- tives for the Ends of Art*. Trans. Peng F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 ---.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 Trans. Cheng Zhanx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 马克·勒伯:《身体意象》,汤皇珍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 [ Le Bot, Marc. *Images of Body*. Trans. Tang Huangzhen.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
- Ponty, Merleau.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Trans. Alden L. Fisher. Bosssdun: Beacon Press, 1963.
-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Zhou Guop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 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Ricoeur, Paul. *From the Text to Action*. Trans. Xia Xiaoya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
- 荣格:《荣格说潜意识与生存》,高适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Jung, C. G. . *The Unconscious and Survival*. Ed and Trans. Gao Shi.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5. ]
- 约翰·塞尔:《心灵导论》,徐英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 Searle, John. *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rans. Xu Yingji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 [ Zhou, Xishan ed. *The Works of Wang Guowei on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7. ]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马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Kristeva, Julia. *Language: The Unknown World*. Trans. Ma Xinmi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 Zhu, Qianzhi.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to Lao tz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责任编辑:王峰)